

●馮其庸 主編

歷代文選
上冊

●馮其庸 主編

歷代文選
上冊

前 言

我國是一個具有悠久的文化傳統的國家，我國的文學，已經有了三千年的歷史。在這三千年的過程中，我國的文學隨著時代的發展，也在不斷地變化、發展、提高。一方面它所反映的社會現實，即它的內容，不斷地有所擴充；另一方面，它反映現實的形式和技巧，也在不斷地豐富和提高。

在我國豐富的文學歷史中，散文是反映現實的一種重要的文學形式。我們這裏所說的散文，是指與詩歌、小說、戲劇相對而言的一種文體，它包括著漢以後的賦和駢體文，也包括著那些隨筆、雜記之類的小品，爲了說得比較恰當一些，我們也可以把它叫作「文」，或者說，是廣義的散文。

在文學史上，我國的散文，是與詩歌具有同樣悠久的歷史的，它的豐富多彩的面貌，與詩歌也可以並駕而齊驅。在我國文學史上，曾產生過許多杰出的語言藝術大師，在這許多語言藝術大師中，有不少就是卓越的散文家，或者，他們既是詩人而又是散文家。

從文學史的角度看，比較可信的最早的散文，是《商書》的《盤庚》篇。這是商代的統治者曉諭臣民的一篇文告，現在讀起來雖然難懂，但却大都是當時的口語。在這篇文告裏，有一些生動的比喻，如「予若觀火」，「若網在綱，有條不紊」，「若火之燎於原」，「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等等。這些比喻，有的至今還活在我們的口頭或書面語言裏。這，可以說是奴隸制時代的散文，其中已含有形象的比喻，是後來發展得波瀾壯闊的一條

散文長流的開端。

春秋戰國時期，是我國歷史上的一個大變動時期，由於生產力的發展，引起了生產關係和社會制度的一系列複雜的變更。這許多變更，在人們的思想意識裏和社會的思想領域裏，也引起了複雜的變化和激烈的鬥爭，形成了「百家爭鳴」和「處士橫議」的局面。在這一時期裏，產生了《論語》、《孟子》、《莊子》、《韓非子》等優秀的諸子散文。同時，在當時頻繁的戰爭和統治階級內部的尖銳鬥爭中，統治階級也不斷地暴露了自己的醜惡面目，使人們增加了對現實的認識，從而也加深了對歷史的認識，因而出現了《左傳》、《國語》、《戰國策》這一類優秀的富有現實意義的歷史散文。從最早的商、周時代的散文，到《左傳》、《國語》、《戰國策》等歷史散文，是一個長足的進展，它們不僅具有了文學的性質，而且已有了許多具有樸素的性格特徵的人物形象。這些作品的語言是相當生動的，而情節也往往頗為複雜，初步具有了後世傳記文學和歷史小說的基本特色。例如《左傳·鄭伯克段於鄆》這篇作品，用冷峻的筆觸，相當生動地刻畫了鄭莊公的偽善陰險的性格，而姜氏的自私、溺愛，共叔段愚蠢、無厭的權勢欲，寫得也具有一定的生動性。作者爲了加深對鄭莊公的思想性格的刻畫，還通過祭仲、公子呂（即子封）、穎考叔等人與莊公的對話，對鄭莊公作了進一步刻畫。總之，通過這一段歷史故事，作者比較生動而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統治階級爲了爭權奪利而骨肉相殘的醜惡面目。特別有意義的是，當作者對他們作了比較尖銳的揭露以後，又描寫了他們「其樂融融」、「遂爲母子如初」的戲劇性場面，這就加深了人們對統治階級表面上「仁慈」骨子裏却是互相仇視殘殺的虛偽面目的認識。《左傳》在描寫人物時，有時也頗能刻畫出人物的某些具有性格特徵的細節，如寫齊莊公去私通崔杼的妻子棠姜時，輕輕地拍打著棠姜房門外的柱子，嘴裏唱著歌，想催促棠姜出來（襄公二十五年）。寫鄭大夫子公爲了證明自己的食指動有肉吃，竟賭氣地「染指」於鄭靈公的食鼎，「嘗之而出」，最後終於弄到「弑君」（殺掉鄭靈公）的地步（宣公四年）。寫衛莊公看見己氏之妻的頭髮生得漂亮，

就派人將己氏之妻的頭髮剃下來給自己的老婆呂姜作假髮用，後來工匠們因爲不堪他的虐待起來推翻他時，他又偏偏逃在己氏的屋子裏，並拿出一塊璧來要求己氏饒命，己氏說：「殺了你，這塊璧難道還跑得了！」（哀公十七年）上面這些細節描寫，都相當生動，已具有一定程度的性格特徵，有助於刻畫不同人物的思想和性格，因而增加了這部書的文學意味。

當然，《左傳》一書在描寫當時那些外交家的辭令和複雜的戰爭場面時，尤富有特色。前者如《呂相絕秦》、《燭之武退秦師》、《臧孫諫君納鼎》等，都能用委婉曲折的文筆，表達出當時巧妙的辭令；後者如《晉楚城濮之戰》、《秦晉殽之戰》、《晉楚邲之戰》、《齊晉鞍之戰》等，都能用簡潔的語言，描繪出當時頭緒紛繁、波瀾壯闊的戰爭場面，真實地反映出當時的歷史面貌。《左傳》的這種帶有鮮明的文學色彩的描寫，是很早就爲人們所認識到的，唐代劉知幾在《史通·雜說上》中曾說，《左傳》在描寫戰爭勝利時「則收獲都盡」；描寫戰爭失敗時「則披靡橫前」；描寫國家強盛時「則滋味無量」；描寫國家衰亡時「則淒涼可憫」。他說《左傳》作者的藝術才能，幾乎可以說是「工作造化，思涉鬼神」，是「古今卓絕」。劉氏的評論，自然不免有誇大之處，但他對於《左傳》的文學性質的認識，應該說是正確的。

《國語》比起《左傳》來說，它的文學性要差一些，但是在某些篇章裏，也有很好的描寫，例如在《魯語》的《里革更書逐莒太子僕》和《里革論君之過》等節裏，就生動地刻畫了一個敢於「以死奮筆」來達抗君命的直臣里革的形象。而在《越語》裏，則更爲生動地刻畫了一個能够發憤圖強、報仇雪耻的賢君句踐的形象，對於范蠡、文種等人的深謀遠見，也有相當生動的描寫，而對於廣大人民同仇敵愾的愛國精神，也有很真實的反映。值得重視的是《晉語》裏晉獻公殺子和重耳走國的故事。這個故事結構龐大，情節複雜，描寫的人物形象却相當生動。這些描寫，顯然不可能全是當時的事實，而是明顯地有著作者的想象和虛構的。例如驪姬向晉獻公所說的那些挑

峻性的話，特別是夜半而泣的那些話，顯然是出於作者的想象。正因為如此，柳宗元在《非國語》裏批評《國語》說：「嘗讀《國語》，病其文勝而言靡，好詭以反倫。」「務富文采，不顧事實，而蓋之以誣怪，張之以闕誕。」這裏，柳宗元是從歷史的角度來批評《國語》的，然而這一批評，恰好反過來證明了這書的文學性。

《戰國策》在先秦的歷史散文裏，也是一部有重要地位的文學性著作，它成功地描繪了蘇秦、張儀等策士的形象，也塑造了荆軻、魯仲連、聶政等敢於反抗強暴的英雄人物的形象。《戰國策》的文章，語言精煉生動，人物的對話，既能口吻畢肖，具有比較鮮明的個性特色，又能跟隨情節的發展，層層深入，縱橫捭闔，鋒芒畢露。特別是它每篇的結構，都比較完整，情節往往曲折動人，頗有後世歷史小說的特色。例如《蘇秦以連橫說秦》、《鄒忌諷齊王納諫》、《魯仲連義不帝秦》、《觸龍說趙太后》等篇，既可以作為優秀的敘事散文來讀，也可以看作歷史小說的濫觴。漢代的劉向曾說過：《戰國策》所寫的，「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為安，運亡為存，亦可喜，皆可觀」（《戰國策書錄》）。劉向在這裏，已經注意了這書的文學性。宋代的李格非，在《書戰國策後序》裏更說：「《戰國策》所載，大抵皆縱橫捭闔譎誑相軋傾奪之說也。其事淺陋不足道，然而人讀之，則必尚其說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辭之勝移之而已。」李格非認識到《戰國策》文章的感染力，贊揚它「文辭之勝」、「其說之工」，這說明他對《戰國策》散文的文學性，是有正確的認識的。

上述這些歷史散文，對後來的歷史散文和政論文的發展，都有重大的影響。

這一時期散文在另一方面的成就，就是前面已經提到的那些優秀的諸子散文。歷史散文是通過敘事來說理的，而諸子散文則主要是說理，不過在說理中也有敘事的成分，而且還運用了許多寓言故事和生動的比喻。由於這個原因，因此歷史散文的現實性是通過對歷史的敘述，對歷史的褒貶而表現出來的，而諸子散文則主要是直接說理，直接對現實問題的辯論，也就是說它的反映現實比較直接。

《論語》是諸子散文中較早的一部，它是孔子門人對孔子和他的學生的言行的「回憶錄」，是一部語錄體的散文。敘事簡潔，語言精煉，含意豐富深刻，是這部書的特色。這是因為書中所記孔子的言行，大都是他的門人們被深深感動過的或受到很大啓發的，所以書中所記孔子的言論，大都具有格言的意味。例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子罕》），「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子罕》），「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公冶長》）。這些語言，都很形象而又含義豐富深刻。

《論語》因為是孔子門人回憶孔子言行的著作，所以全書雖然只是記述孔子的片言隻語和某些片斷的行實，但仍舊給我們描繪下了孔子的形象。他熱心於政治，栖栖惶惶地到處奔走但又到處碰壁，他刻苦學習，誨人不倦，他謙虛而誠懇，他竭力提倡當時已逐漸不被人重視的「禮」和「德」，他到處宣傳「仁」、「愛人」的思想，企圖調和當時尖銳的階級矛盾。總之，讀《論語》這部書，孔子的思想、感情、孔子的舉止動作、聲音笑貌，常常能從樸素而精煉的語言裏躍躍然地活動起來。《論語》對其他一些人的性格，刻畫也頗為生動，如子路的率直粗暴、見義勇為，顏淵的謙虛好學，子貢的聰明，都寫得較為成功。尤其是《先進》章的《侍坐》一節，描寫孔子師生坐而言志的情景相當生動，語言雖甚簡潔，但各人的性格都比較鮮明，生活的氣息也較濃厚。

當然，從全書來看，《論語》不能作為一部純然文學性的著作，《論語》對後來的散文雖然有影響，但比起它在思想方面給後世的影響來說，顯然不如後者的影響巨大和深遠。不過，從殷周時代的佶屈聱牙的散文發展到《論語》的散文，應該說同樣是一個很大的進展。

在諸子散文中，《孟子》的文學成就和影響是很突出的。《孟子》基本上是孟軻本人的著作，因此全書的風格比較統一，它具有縱橫捭闔、宏偉奔放的氣勢，它的言辭鋒利，咄咄逼人，而有時又幽默詼諧或曲折入情。

孟子的思想是儒家的民本思想，所以在維護統治階級的統治權的原則下，他也尖銳地揭露了一些不知愛民的

「人君」，他認為歷史上的紂王是一個暴君，是獨夫，應該受到人民的誅滅，他揭露梁惠王實質上是與別的君主一樣地不愛人民，他與別的君主比較，不過是五十步與百步之比，沒有根本的差別。他諷刺梁襄王說：「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接近了他，看不見可以被別人尊敬的地方）焉。」他罵那些幫助君主剝削人民的大臣說：「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從這些話語，我們可以看到孟子對統治階級的揭露，言詞確實是十分鋒利的。

《孟子》的文章，十分善於用比喻，有一些比較抽象或複雜的問題，往往經過他形象的比喻以後，就使讀者一目了然。例如「挾泰山以超北海」、「緣木求魚」等比喻，至今還被人們運用。

《孟子》的文章，非常富於論辯的技巧，他常常能把對方不知不覺地引導到自己否定自己的結論上去，從而使對方沒有任何反駁的餘地。

《孟子》的文章最大的特色，是那種雄辯的不可阻擋的氣勢，是那種說理的明朗性和形象性，是那種比喻的生動性和豐富性（有時是用生動的故事作比喻），是那種嚴密的邏輯力量。他的文章，確實具有「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的氣勢，因此後來的人，常稱贊《孟子》的文章氣盛。宋代的蘇洵曾說《孟子》的文章「其鋒不可犯」（《上歐陽內翰書》），蘇轍也說：「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弘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大小。」（《上樞密韓太尉書》）

《孟子》的文章比起《論語》來，確實是一個重大的發展，因為它不再是《論語》式的語錄體，而是發展成規模相當宏大的長篇大論的散文了。《孟子》的文章，直接影響到唐宋時代古文家的文章，它在散文史上是有突出的地位的。

與孟子同時而稍後的是莊子。《莊子》一書，內篇大體是他本人的著作，外、雜篇則是他的門人或後學所作。

莊子的思想是代表當時沒落的奴隸主階級的思想，他對新興的地主階級懷著深刻的仇恨，他對封建地主階級以及那個時代進行了尖銳的批判，同時又從這些批判中表示了自己對現實世界絕望和虛無的心情。莊子思想對後世起著複雜的影響，一方面，他的主觀唯心主義和虛無主義的人生觀，給後世以消極的影響；另一方面，他對當時新興的地主階級及其意識形態（主要是封建禮教和道德觀）的批判，又往往成爲後世一部份文人反對封建統治和封建道德的武器。所以對於莊子思想給予後世的影響，須根據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的具體情況進行具體分析。

莊子的散文給予後世的影響是巨大的。他的散文的總的特色，就是那種汪洋恣肆、不可捉摸、縱橫排宕、光怪陸離和雄偉奇麗的浪漫主義風格。《莊子》的文章（包括外、雜篇在內），在先秦諸子中，是最富於想象力的。一個普通的事物，在作者的想象之下，往往現出特殊新奇的意味來。例如在他想象中的天，是「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這裏不僅寫出了人們從下往上看天時所見的深遠莫測的景象，同時又想象了從「遠而無所至極」的絕高的高空往下俯視時的景象。再如在他的想象的描寫下，一個庖丁解牛，竟會神奇到「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樂章名）之會」。這樣，現實生活中腥臊繁重的勞動，在他的筆下，竟成爲一次神妙的音樂舞蹈藝術表演。不僅如此，莊子還常常憑藉他奇妙的想象力，虛構和創造出一些具有浪漫主義精神的藝術形象來。他說：「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不受病害）而年穀熟。」這裏他生動地刻畫了一個「肌膚若冰雪」的縹渺渺的神仙的形象。

《莊子》一書對於儒家所代表的封建道德的批判是尖銳的，儒家所標榜的「仁」、「義」，他認爲即使是強盜也是有「仁」、「義」的（見外篇《胠篋》）。如《外物》篇中的《詩禮發冢》，對儒家的詩、禮批判得十分辛辣，它生

動地描繪了兩個嘴裏哼著《詩》、《禮》，却在半夜裏偷盜別人墳墓的儒者的形象。至於《肱篋》篇裏罵統治者「彼竊鈎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等，這是早就傳誦的了。《莊子》書中對那些消極對抗封建社會的隱士，也作了熱烈的歌頌。這可以拿《讓王》篇中對曾參的描寫爲代表：

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麻袍已經沒有了面子），顏色腫喻（浮腫），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把帽子戴正）而纓絕（帽帶就斷了），捉襟而肘見，納履而踵決（鞋後跟就裂斷了）。曳縱（拖著破鞋）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這裏，曾子艱苦卓絕的生活和傲岸不屈的精神，是寫得十分成功的。

《莊子》的文章，具有長江大河浩蕩奔騰的氣勢，而又波瀾重迭，變化生姿。這可以拿《逍遙游》爲代表。這篇文章是在宣揚他的絕對自由的思想，這種思想，自然是應該徹底批判的。然而這篇文章却寫得汪洋恣肆，變化莫測。林雲銘說：「篇中忽而叙事，忽而引證，忽而譬喻，忽而議論，以爲斷而非斷，以爲續而非續，以爲復而非復。祇見雲氣空濛，往返紙上，頃刻之間，頓成異觀。」（《莊子因》）作爲對這篇文章的藝術方面的評論，這幾句話，是符合實際情況的。與這書的汪洋恣肆的風格相適應的，是它那豐富而新奇的語言。魯迅說莊子的文章「汪洋闢闔，儀態萬方，晚周諸子，莫能先也」（《漢文學史綱要》）。這是很切當的評論。

《莊子》的文章，對後世影響很大，魏晉時期的文人，很多都受它的影響，宋代的蘇軾，也是受《莊子》影響很深的一位散文家。

其他戰國時期的諸子散文，其較著者，還有《墨子》、《荀子》和《韓非子》。墨子本人是不主張文學的，所以他的文章質樸無華，純是說理。然而他十分重視論辯的邏輯性，創立了「三表」法，這就是立論時，一要考察歷

史，求證於古事；一、要揣度民情，瞭解現實；三、要檢驗效果，觀察實際的應用。因此，他的文章論證嚴密，議論透徹，行文條暢明快。這種特色，以他的《非攻》上最為顯著。《墨子》的文章，雖然不能說有鮮明的文學性，但它對後世論辯文的發展，是有積極作用的。他的時代早於孟子，所以他的長篇大論的論辯文的形式和嚴密的邏輯力量，對於孟子及以後的文章，也有一定的影響。荀子是戰國後期的一位儒學大師，他的學識鴻博，因此他的散文樸實渾厚，說理透闢而又取譬精警，是學者之文。《荀子》集中還有賦篇，共有禮、知、雲、蠶、箴五篇短賦，以四言為主，間用雜言，有韻，是對話的形式，文體介乎駢散之間，對後來的漢賦有一定的影響。

韓非是法家學派的集大成者，他的文章，嚴峻峭刻，抉剔世情，深入隱微，具有法家的特色。另外，韓非處於他的祖國（韓國）危亡之際，而自己又不得任用，韓王遣他人秦以後，即為李斯所害。所以他的《孤憤》、《說難》諸篇，充滿著憤怒的情緒。明代的茅坤說韓非的文章「沉鬱孤峻，如江流出峽，遇石而未伸者，有哽咽之氣焉」（《韓子評選後語》）。韓非也喜歡用寓言故事來說理，所以在他的集子中，還保留著許多生動的寓言故事，而且較高的思想性和藝術性，對後世有一定的影響。

從上面概括的敘述，我們可以看到春秋戰國時期的散文，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第一，它反映現實的廣度和深度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它能够敘述曲折複雜的歷史事件，能夠有條不紊地安排許多頭緒紛繁的故事情節，它也能够描寫人物的性格特徵和人的形象。從諸子散文中，我們也看到他們對現實和歷史認識的深度，他們對人生作了廣泛的探究，總結了某些經驗。值得注意的是，除個別人物以外（如莊子），這些作家，他們對現實大都抱著積極的態度，因此他們在反映現實時（自覺或不自覺地），不是採取消極旁觀的態度，而是對現實有所批判，在不同程度上對人民有所同情的。第二，從他們的文章中，我們已經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各個不同作家或作品的獨特的個性和風格，看到他們掌握語言的不同的技巧，而且我們也可以看到他們無論在敘事或說理中，已經注意

到了文采，或者說，注意到了語言的藝術性，因此他們的作品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了文學的性質。第三，開始確立了散文的最基本的形式，這就是史傳文（也可說敘事文）和議論文，後世的散文，自然還有許多發展變化，但和以上兩種形式都是有密切關係的。第四，我們應該注意到散文在這一時期，更多地被人們注意到的，還是它的實用的價值。即使是具有浪漫主義特色的藝術性相當高的莊子的散文，也仍然是作為一種哲理文出現的，作者主要的目的還是爲了表達自己的哲學思想。這就是說，在這一時期文與史，或者說文與理還沒有區分，散文作爲一種獨立的藝術作品，還有待於以後歷史的發展。因此，在這一時期，我們還不能看到純粹是抒情或寫景等類的文章。

秦代爲時很短，在文學上沒有能像在歷史上一樣，顯示出它的劃時代的功績。然而它却產生過比較優秀的散文家李斯。他在戰國末期寫的著名的《諫逐客書》是代表作。他在這篇文章裏，廣泛地引證史實，駁斥秦始皇橫蠻逐客的錯誤措施，說明逐客一事在政治上對秦國的嚴重不利，終於使秦始皇取消了「逐客令」。這篇文章，排比鋪張，結構整齊，筆勢縱橫，詞藻豐腴，在風格上有戰國時縱橫家文章的餘風，在結構和語言上，又開啓了後來漢賦鋪敘藻飾的特色，可以看出是從先秦散文到漢代散文和漢賦的一個橋梁。此外，李斯還爲秦始皇寫了紀功的幾篇刻石文，這種刻石文字，實際上是先秦青銅器銘文的發展。

兩漢的散文，我們可以分三方面來敘述：一是賦，二是政論文，三是史傳文。

從我們現在來看，大部份的漢賦實在沒有什麼文學價值，然而在漢代，它却是盛極一時的一種文學形式。它講究鋪敘，講究詞藻，運用對話的形式，實質上是一種介乎詩與散文之間的東西。它的獨立的形式，應以司馬相如的《子虛》、《上林》、揚雄的《甘泉》、《羽獵》、《長楊》和班固的《兩都》、張衡的《兩京》等賦爲代表。漢賦

的發展是有它的社會原因的，一方面因為漢代前期社會比較安定，經濟有所發展，社會物質財富有顯著的增加，國力强盛，統治階級過著奢侈享樂的生活，需要一批文人來為它歌功頌德，因此他們提倡寫作辭賦；另一方面賦是一種新起的文體，它適宜於作鋪張揚厲的描寫，在這種情況下，賦的寫作，便成為一時的風氣。初期的漢賦作家，主要是賈誼、淮南小山、枚乘、孔臧等人。賈誼的《吊屈原賦》是一篇藉屈原以自吊的抒情作品。賦中對於時代的黑暗，作了頗為尖銳的揭露，如說：

遭世罔極（無道）兮，乃隕厥身（乃喪其生）；烏虜（烏呼）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鷓鴣翔翔。蘭茸（小人）尊顯兮，讒諛得志；聖賢逆曳（倒懸）兮，方正倒植。

這顯然是對當時社會現實的批判。從文體上看，這是在《楚辭》影響下的作品，所以人們把它叫做騷體賦。與此相類的是淮南小山的《招隱士》。枚乘的《七發》，則是運用對話的形式，文中洋洋灑灑，誇張地描寫和揭露了統治階級的驕奢淫逸的生活，具有暴露批判現實的作用。這篇作品，與賈誼的《鵬鳥賦》、孔臧的《諫格虎賦》一樣，都是運用散文的形式而在中間或句末用了韻，所以它的散文文化的特色是很明顯的。

初期的賦雖然沒有定型，但它的思想內容却比較好，它還沒有發展成為後來那種主要是歌功頌德的作品，它在形式上也還沒有趨於僵化。漢賦鼎盛的時期，是自漢武帝到漢安帝的時代，這也是司馬相如和揚雄、班固等人的時代。司馬相如是奠定漢賦形式的主要賦家，後來揚雄、班固等人的作品，在形式上都是模仿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上林賦》。《子虛賦》是寫楚使子虛使齊，向烏有先生和亡是公盛誇楚國雲夢之事（楚王在雲夢澤打獵的事），烏有先生說他言過其實，不應該誇耀這種淫樂侈靡之事。《上林賦》則是敘亡是公聽了子虛、烏有兩人的對話以後，認為齊楚之事，皆不足道，因為他們沒有聽到過天子的上林苑，於是就洋洋灑灑地鋪敘描寫起上林苑來，最後又歸之於勸諸侯節儉，略寓諷諫之義。這兩篇賦實際上是一篇，形式上完全是對話體，對事物的描寫則東南

西北，上下左右，挨次鋪叙，極盡堆砌雕飾之能事，這就是典型的漢賦的特色。

東漢中葉以後，政治腐敗，社會混亂，國勢衰弱，再也沒有過去那種強盛安定的局面，因此反映到文學方面，漢賦也就由過去鋪張排比的大賦，轉變為抒情、咏物或揭露社會黑暗的小賦。這一時期的作家，以蔡邕、趙壹、禰衡等人為代表。蔡邕在《述行賦》裏說：「貴寵扇以彌熾兮（權貴們的氣焰越來越盛），僉（皆）守利而不戢（息）。前車覆而未遠兮（指梁冀新誅），後乘驅而競及（指徐、左等權貴）。窮變巧於臺榭兮（府第造得越來越奢侈），民露處而寢濕；消嘉穀於禽獸兮（禽獸吃著好的穀子），下糠粃而無粒（人民連糠粃都沒有吃）。」在這篇賦的叙文裏，作者說他寫這首賦是因為「梁冀新誅，而徐璜、左悺等五侯擅貴於其處，又起顯陽苑於城西。人徒凍餓，不得其命者甚衆，白馬令李雲以直言死，鴻臚陳君（蕃）以救雲抵罪。璜以余能鼓琴，白朝廷，敕陳留太守發遣余。到偃師，病不前，得歸。心憤此事，遂托所過，述而成賦」。根據這段叙文，可證這首賦是當時的社會現實和政治鬥爭的反映，而上面所引的文句，也可以看出作者同情人民，尖銳地抨擊統治階級的思想。可見這時期的賦，與司馬相如的那些賦，已經確有不同了。這種批判性，以趙壹的《刺世疾邪賦》最有代表性，他對封建社會的黑暗，真是作了最尖銳的揭露。這首賦，可以說是漢末社會現實的寫照。另外，禰衡的《鸚鵡賦》也是一首憤世疾俗的作品。

總之，漢賦到了後期，確實有了許多變化，從形式方面來說，它變得短小精悍，同時也不再是那種對話的形式，而是作者的直接描寫了。從內容方面說，則更是叙事、抒情、咏物、說理各方面都有所發展，而它們的總的精神，則常常是對現實的批判和揭露。所以對於漢賦，我們也應該仔細地鑒別，批判地吸取它的精華，不宜簡單地一概否定。

漢代的政論文，是比較發達的。這是因為漢代統一以後，經過了漢初幾十年的休養生息，一方面社會財富逐

漸增加了，而另一方面，統治階級對人民的統治和剝削也越來越殘酷了。因此社會階級矛盾有了進一步的發展，而同時由於漢初分封諸王，逐漸形成了後來的割據局面，加深了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面對著這種現實情況，漢代政治家們紛紛對現實進行了揭露和批判，同時也不斷地提出了改革政治的意見，所以漢代的政論文，大都是奏疏表策這一類的作品。

西漢比較優秀的政論文作家，首推賈誼和鼂錯。賈誼的代表作品是他的《治安策》、《過秦論》等。前者針砭時弊，切中要害，後者檢討秦始皇覆亡的原因，引為鑒戒，具有藉古喻今的作用。《過秦論》的文章，氣勢磅礴，筆鋒犀利，義論深切，是一篇（包括上中下三篇在內）杰出的政論。鼂錯是一位優秀的政治家，因為建議削減諸侯封地而被殺。他對於當時邊防的空虛，政治的腐敗，以及日益尖銳的社會階級矛盾，都有深切的認識和積極的措施。他在《論貴粟疏》裏，剴切地陳述了重農貴粟、抑制商人剝削、安定農民的生活和生產情緒以緩和當時的階級矛盾的主張。鼂錯是一位實際的政治家，所以他的語言樸實而簡練。賈、鼂的政論文，可以說是漢代政論文的代表。

西漢時期桓寬的《鹽鐵論》也是一部出色的政論文。他改造和發展了漢賦對話的形式，生動地描寫了漢昭帝時期政府所召集的一次鹽鐵會議的大辯論。其他，如劉向的《新序》和《說苑》，東漢時期王充的《論衡》，王符的《潜夫論》，崔實的《實論》，仲長統的《昌言》等，也都是優秀的政論文或哲理性的散文。

漢代政論文特色，是語言樸實，說理透徹，針砭深刻，而其思想內容，則一反漢賦的基本特色，不是對統治者以及這個時代的贊美歌頌，而恰恰是對它的揭露和批判（當然作者的目的是，大都還是為了向統治者獻策救弊），無論從思想內容和語言特色來說，可以看出，漢代的政論文是《戰國策》中「書說」一類作品和先秦諸子文學的繼承和發展。

漢代的史傳文，是有突出成就的。因為這個時代，誕生了偉大的歷史散文家司馬遷，後來，又出現了優秀的歷史散文家班固。

司馬遷的《史記》，是一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報任安書》）的偉大歷史著作，同時也是一部具有強烈的批判精神、鮮明的人民性的偉大的文學性著作。它對歷史上的暴君，特別是對漢代的統治階級以及那些酷吏，作了十分尖銳的揭露和批判，對漢代的社會矛盾也有真實的反映，而對社會上的那些被壓抑的人物則寄予了同情。從文學的角度看，《史記》的成就就是杰出的。首先，它創造了一系列性格鮮明的歷史人物的藝術形象，舉凡帝王、后妃、將相、官吏、文學家、俠士以及懷有一技之長的技藝人員，它都有十分成功的描寫。司馬遷十分善於抓住各種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徵，通過具體的歷史事件和某些細節的描寫，來表現歷史人物，因此他筆下的人物，很多是栩栩如生，各有自己獨特的個性特徵和精神面貌的。例如他寫項羽，則有一種狂飈突起、暗噀叱咤的精神和拔山蓋世的氣概；寫劉邦則活畫出一個豁達大度、善於用人而又有點流氓氣質的皇帝；寫李廣，則充分刻畫了他的才氣無雙、猿臂善射、長於治軍而又身先士卒的名將本色；寫荆軻，則又充滿了那種悲壯的、慷慨激烈的情調；至於廉頗的魯莽忠勇，藺相如的顧全大局、忍讓寬容，信陵君的謙遜仁厚、禮賢下士，也都各各表現得恰如其分，真實感人。

司馬遷是一位卓越的語言藝術大師，他不僅善於具體地刻畫描寫，而且深知文章章法結構的重要。因此他的人物傳記，各篇的結構各不相同，他根據各種人物的具體特點（也即是文章的具體內容），創造性地安排了各種不同的結構。例如《項羽本紀》這篇文章的結構，是以項羽為中心，以當時軍事進退的路綫為綫索，以各個重大的戰役和政治事件為描寫的重點；這樣從八千人渡江而西起，通過召平、陳嬰、黥布、蒲將軍、范增的歸附；通過對殺宋義、戰鉅鹿、降章邯，以及鴻門之宴、分封諸侯、彭城大戰、滎陽之圍、廣武相持、鴻溝劃界、垓下之

圍等一系列的戰役和政治事件的描寫，項羽這個人物的形象和性格特徵，便愈來愈鮮明突出地呈現在讀者的面前。在結構上，項羽的行動，當時進退的軍事路線，便是貫穿這篇文章的一條主綫，而各個戰役的描寫，就成爲這條主綫上的一座座層巒迭起的高峰，因而形成了這篇文章單綫發展和峰巒起伏的結構特色。文章開始時，項羽自東而西，一路上各地的起義軍紛紛歸附，如百川之歸大海，這樣就展示了當時四海紛擾、風起雲涌的混亂局面，同時也寫出了項羽乘時崛起、力量不斷壯大的過程，分封諸侯以後，項羽的軍事路線便自西而東，而他的力量，又通過一系列的戰役，愈來愈土崩瓦解，如山崩雪消，不可收拾，終至於最後滅亡。顯然，這篇文章的結構，是經過司馬遷的匠心經營的。

《魏其武安侯列傳》也是一篇具有顯著的結構美的作品。爲了充分地揭露竇嬰、灌夫和田蚡之間的也即是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作者采用了與《項羽本紀》完全不同的網式的結構。一開始他采取了將魏其、武安這兩個矛盾的主要人物並列的寫法，中間又插入了一個灌夫，這樣使三個人的事情，互相糾纏在一起，矛盾發展到尖銳的時候，則連武帝、王太后都捲了進去，最後是田蚡獲勝，灌夫滅族，竇嬰棄市。而當田蚡剛剛獲勝以後，忽然又暴病而死，這樣，矛盾著的三個人，便同歸於盡，文章也就結束。司馬遷運用這種網式的結構，使這三個人之間的矛盾充分展開，讓他們互相揭露，從而充分地暴露出他們的醜惡面目。

研究司馬遷文章的結構特色，對我們的散文寫作，無疑是有借鑒作用的。

司馬遷是一位卓越的語言藝術巨匠，他的語言具有很強的表現力和雕塑感。他所描寫那些歷史人物的形象，有一些確實使你有一種幾乎可以用手指觸摸的感覺，這是因爲他善於描摹客觀事物，善於精確地使用語言的緣故。例如《項羽本紀》裏的「鴻門宴」、「垓下之圍」等節的描寫，《魏其武安侯列傳》裏的「灌夫使酒罵座」、「魏其武安廷辯」等節的描寫，就是具有鮮明的雕塑感的文字。